

1

聚焦東亞

回顧歷史，中國古代的「絲綢之路」早在兩千多年前就已開始在做跨境的區域整合，唯獨規模限於交通與貿易流量並不大，卻也彰顯中西方在文明與貿易交往的意涵深遠。西漢時期，中國以長安為起點，經關中平原、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到錫爾河與烏澹河之間的中亞河中地區、大伊朗，並聯結地中海各國的陸上通往歐亞北部所形成的商路，開啟中西方貿易流的沿點對接，其中又以絲綢製品的影響最大，故得此名。

到了近代，歐洲整合由1943年比利時、荷蘭及盧森堡三國流亡政府在倫敦簽訂「荷盧關稅同盟」(Benelux)，同意實施貨幣掛鉤與降低關稅的關稅同盟，並在1948年1月1日正式生效實施，開啟了西歐區域整合的先例。此後，1951年德法兩國為發端的「歐洲煤鋼共同體」(ECSC)為始，由經濟面整合進而尋求會員國在各面向的整合與發展的過程，為後來的歐盟的成立奠定基礎。

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全球化加速改變了世界地緣政治與經濟格局，「區域整合」(Regional integration)或「區域經濟一體化」(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已成為大國開展戰略合作與競爭的重要手段。近年來，中國、韓國、日本等相繼與東盟成員國建立自由貿易區，力圖在區域內構建其利益共同體，主導區域經濟整合進程。而另一頭，隨着中美兩國在亞太地區經濟實力的消長因故，由中國主導的區域經濟整合進程已會進一步加快推動地緣經濟政治變化和權力轉移，區域權力博弈格局亦即加劇。或許，有些社會聲音會質疑，區域經濟整合經常都在新聞、報章上談到，最終都沒有什麼實際進展？說到這裏，民眾對全球化的認識或許就多一點，而對區域經濟整合就沒有什麼清晰的概念。

起錨點：區域經濟整合

全球各地區都在進行區域整合的當下，一個穩定的國際體系就格外重要的，否則整合進程難以在動盪及不穩定的國際環境下進行。所幸之事，是二戰過後就沒有出現大規模的戰爭，為戰後重建及去殖民化創造更多的發展契機。其中，大多數都以開放及經濟發展作為各國邁向現代化國家發展。綜觀東亞，多國認知到搞意識型態的對抗始終是無利於國家的發展，甚至在國際社會面對更多的孤立與制裁。然而，這一大勢所趨的背後必然有一套強而有力的理論去支持。美國經濟學家金德爾伯格（Charles P. Kindleberger）及國際關係學者吉爾平（Robert Gilpin）相繼提出及修正霸權穩定論（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HST），一個以美國霸權為中心的全球新自由主義秩序，透過相互依賴來增加彼此發動戰爭或發生衝突的成本來降低戰爭的機會。在這種環境下，各國更願意採取合作，在自由主義體系下持開放的態度謀劃符合國家發展的道路。全球化進一步深化貿易、金融、投資、勞動力市場和理念在全球市場日益一體化。到了90年代，東亞就相繼出現「亞洲四小龍」（台灣、香港、新加坡及南韓）以及「亞洲四小虎」（泰國、馬來西亞、印尼及菲律賓）。

美國主導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從國際分工、國際貿易和收入分配三個方面加劇了世界經濟的不平衡，而且這種不平衡不再僅僅對發展中國家不利，也導致發達國家的政治和社會風險日益明顯。目前全球化進入深度調整和轉型階段，即西方統治精英的全球主義共識被削弱，市場邏輯與國家主體進入重新博弈階段，全球經濟治理呈現進一步碎片化（Fragmentation）趨勢。究竟全球化帶給東亞的是一個怎樣的發展道路？面對不對稱的發展模型與不公平的發展結果，東亞國家該如何面對這些矛盾的挑戰？



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大部分東南亞國家成為了歐洲國家的殖民地，而日本當時亦對擁有豐富資源的東南亞地區虎視眈眈。

1990年代國際間再度興起區域經濟整合的風潮，當「關稅和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下的多邊貿易談判進展緩慢時，東亞開始使用「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s, FTAs)來促進貿易自由化(Liberalization of trade)。特別是世界貿易組織(WTO，簡稱世貿組織)多邊自由化的進展受阻，而自由貿易協定迅速擴散，東亞區域變得更加互聯、網絡化和區域化，區域內整合亦有很大的進展。這種擴散不僅受到世貿組織多邊方式的單軌驅動，而且受雙邊和區域方式的驅動。越來越多的自由貿易協定促使地區國家實施區域機制，以促進和惠及東亞地區貿易的自由化。

位處歐亞大陸邊緣的東亞地區，不僅獨特於地緣關係，同時也是區域主義的「前線戰場」，尤其是在區域自由貿易化與整合制度的不同。21世紀的東亞，由於近年發起的巨型自

由貿易協定（Mega FTA）已逐漸醞釀出新一波的區域主義浪潮，尤其是東盟加三、東盟加六、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與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 RCEP）等相繼出現，互別矛頭，視為競爭式區域主義（Competing regionalism）。

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的統計報告顯示，覆蓋東亞經濟體已簽署和生效FTA的累計數量從1998年的38個增加到2016年2月的147個，其中79個FTA（約54%）。在68個自由貿易協定中，東亞經濟體也佔49個，這些自由貿易協定當中有些已經生效，有些還在談判中。東盟加三國（ASEAN Plus Three, APT）、東盟加六（ASEAN Plus Six, APS）、TPP和RCEP等巨型自由貿易區相繼生效或即將完成。這些FTA之間所產生的衝突不僅引發了一系列有關東亞區域化進程中經濟相互依存的疑慮，同時也產生了安全困境的問題，並且被引入了東亞地區主義的競爭框架之中。

除了東亞區域內出現多個自由貿易整合外，中國崛起也被視為東亞競爭型區域整合的主角。當前的中國已經佔踞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並在全球製造出口的份額超越美國、日本，成了全球最大的製造出口大國。中國的外匯儲備已經逾三兆美元，是全球最大的外匯儲備國。隨着貿易流帶動更多的經濟聯繫，人民幣在國際主要流動貨幣體系的地位日益顯著，並已被國際貨幣組織提升人民幣在特別提款權的份額。其次，中國從1997年開始積極地融入亞太地區的區域整合，其參與度不斷增加，並且與美日早在東亞建立的經濟建制下相互競爭。中國崛起提升了一個互相依賴的網絡與台階，也促進了周邊地區經濟增長，並與周邊國家聯繫在一起展開合作與競爭關係。中國與地區國家之間的經濟聯繫不斷加強，東南地區沒有一個國家能夠擺脫中國因素的支配地位，逐步取代日本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



近年，中、美兩國之間的經濟競爭不斷，並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東亞區域，中國亦積極融入亞太地區整合，與周邊國家建立經濟聯繫。

機之前的經濟主導地位。然而，今日崛起的中國經濟，已經是具備移植整條生產線及資金流的經濟大國，「Made in China」所夾帶的資金與成本優勢給東南亞當地社會帶來不單只是外來資金，更多的是「價格競爭」（Price competition）。在經濟學，成本帶動價格下跌增加了生產者的獲利空間，對消費者而言，消費者剩餘¹隨之增加亦是好事；但對於本地的生產者就並非善事一樁了，如果「低廉競爭」是源自國外生產者或出口商，而非在地生產者，定然會在惡性的價格競爭與生產關係兩大主因下，把在地生產者的產業價值鏈的最底端都盤走，盡顯在地中小企業與勞動者面對着無所適從的競爭與被淘汰的壓力。

1. 經濟剩餘是用於經濟學的一種概念，分為消費者盈餘、生產者盈餘及兩者加總形成的總盈餘。消費者剩餘（consumer surplus）是指購買者的支付意願減去購買者的實際支付量。消費者剩餘衡量了購買者自己感覺到所獲得的額外利益。

筆者以經濟、政治以及制度競爭三個支柱審視東亞的競爭區域主義，所引介的互動式五力競爭模型，論述複雜的相互依賴、東亞區域主義之間的因果聯繫以及內生和外生競爭來說明東亞競爭性區域主義。筆者探討了這樣一個問題：「經濟相互依存在競爭意義上增加還是減少了東亞國家之間的合作？」同時，全球供應價值（Global Supply Value, GSV）的競爭早已存在於東亞區域經濟發展模型之中；另一方面，中美和「中日關係」，特別是它們的合作與競爭，是東亞地緣政治亟需應對的問題。至於東亞區域國家的決策者能否在無憂的競爭結果下，促使這些國家加強相互依存而實現更多的增長？在長期，這些競爭現象會為東亞區域主義創造一個負零和博弈嗎（Negative zero-sum Game）？

何謂區域主義？

區域主義的發展在過去並未獲得很多的關注，直至上世紀80年代才開始被學界着墨探討。有些學者會把「區域主義」（Regionalism）與「區域化」（Regionalization，中國內地稱為一體化）混為一談，兩者之間實際是有所差異。區域政治研究學者Louis J. Cantori 與Steven Spiegel等人（1970）針對區域主義做出這樣的定義，強調地理鄰近性，國際互動，共同紐帶（種族，語言，文化，社會和歷史）以及有時受到該地區以外國家影響的認同感。在西歐的區域主義中，一般被分成三個學派：跨政府主義（Inter-governmentalism），聯邦主義（Federalism）與功能主義（Functionalism）。Mitrany（1933）提出了基於跨國合作的國際新秩序，其重點是有效管理有限的資源，以建立積極的合作關係並創建有效的和平系統。跨政府的背景意味着實現區域合作和一體化必須由同一地理區域內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的政府決定，以促進不同領域的合作。其次，Boka（2005）

認為Altiero Spinelli的憲制聯邦主義（Constitution-federalism）具有較強體制組成的成份，並側重於立即建立聯邦政治機構，首先是對所有歐洲公民直接負責的超國家政府（Supranational government）。這一重點是建立一個社區和共同市場，這不僅需要國家之間的超國家合作，還需要採用共同的經濟政策和系統的規劃程序治理。新功能主義（Neofunctionalism）的Hass（1964）表明國家可以通過相互依存走向更密切的合作，溢出效果（Spillover effects）概念取代了超國家方法中的跨界協調。

Hettne和Söderbaum（2000）將區域主義的發展演繹成一個高度內生的過程，由各種經濟、社會文化、政治和歷史路徑依賴因素形成，而這些因素已處於或嵌入在當地，並且不會導致一致性的經驗。另一派學者則着重於政治經濟學視角，Bhagwati（1999）將區域主義定義為一部分國家中所做出的優惠貿易安排（Preferential Trading Agreement, PTA），因為PTA可被視為是在特定協議下操縱一組國家之間的貿易流動的有意的舉措；而區域化只是指由於地理位置接近而將當地經濟納入鄰近經濟體。本書則以國際政治經濟學視角嵌入在區域經濟整合的理論之中。

